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泮溪 传播学论坛

PANXI
CHUANBOXUE
LUNTAN

戴元光 主编



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

单波 李加莉

论新闻传媒研究中的社会责任和问责概念

郑涵 沈荟

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群——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年

戴元光 陈纲 许建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构关系考

赵伟清

在信息传播技术(CTs)世界中反思政治

萨拉·本替凡格纳

一项对于互联网民意测验的批评：作为象征性再现和假事件

迈克尔·L·肯特 泰勒·哈里森 莫琳·泰勒

泮溪传播学论坛

第3卷

第2辑(总第5辑)

泮溪传播学论坛

主 编 戴元光

副主编 郑 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取了国内外传播学术界有关当前热点学术问题的论文,以理论思辨、历史考证、定量研究、文化研究等诸多方法,探索了国际国内新闻传媒领域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理论与分析工具,梳理和反思了当代中国传播学术研究的演变轨迹,并揭示其所存在的问题,考证了中国租界时期电影审查制度的建构历程,从历史和批判的视角阐释当代西方广告中的性表现。另有一组论文,在当代传媒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性语境中,以历史传统议题和当代新问题彼此衔接的研究取向,检讨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组织传播论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泮溪传播学论坛/戴元光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ISBN978-7-313-05460-9

I. 泮... II. 戴... III. 传播学—文集 IV. G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419 号

泮溪传播学论坛

戴元光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立信会计出版社常熟印刷联营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0.25 字数:377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13-05460-9/G·1044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泮溪传播学论坛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许正林 金冠军 吴信训

张文俊 张咏华 郑 涵

郝一民 戴元光

编委主任: 金冠军

主 编: 戴元光

副 主 编: 郑 涵

前 言

传播学是年轻的学问,传播却是与人类历史一样长的活动。“传播与人类共生共存,它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与利益,也给了人类许多的烦恼与困惑”。传播学的这一特点将使传播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

本书将秉承一贯的编辑思想,即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传播学发展与研究,尊重不同的学术思想,关注传播学发展中的新动向、新观点、新信息,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一个新天地。

本书将服务于所有传播学研究者和传播学爱好者,为所有与传播学有关的同仁,包括中国的同仁和外国的同行,提供进行文化关照的信息。

本书完全尊重学术自由的历史传统,积极倡导健康的研究活动,欢迎对传播学(传播)展开学术讨论,包括探讨、争鸣、批评和反批评。

本书的宗旨仍然是:学术自由,百花齐放,坚持真理,包容悖论。

目 录

理论研究

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	单 波 李加莉	3
从“四种理论”到“去西方化理论”		
——比较媒介研究的演进	展 江 王晓笈	19
论新闻传媒研究中的社会责任和问责概念	郑 涵 沈 荟	46
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反思	赵为学	58
媒介生产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萧伦 L. 伯西 著	
	杨佳楣 译 戴元光 校	75

中国传播学

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群

——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年	戴元光 陈 纲 许 建	99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构关系考	赵伟清	117
晚报未到末日,但要创新		
——从《新民晚报》第五次改版谈起	黄 强 桦 山	142

传媒与公共空间

在信息传播技术(ICTs)世界中反思政治	萨拉·本替凡格纳 著	
	周健华 译 郑 涵 校	187
信息传播新技术与“公共性”问题	玛利亚·赫勒 著	
	周健华 译 郑 涵 校	197

网络研究

虚拟运作:虚拟工作团队关于媒介使用和关键结果的交流和结构预测

指标 埃略克·梯莫曼 克雷格·斯考特 著
吴小坤 译 郑 涵 校 213

网恋关系的关系满意度预测指标 ... 特雷西·安德森 塔雷·埃默斯-萨默 著

吴小坤 译 郑 涵 校 244

一项对于互联网民意测验的批评:

作为象征性再现和假事件 迈克尔·L·肯特 泰勒·R·哈里森
莫琳·泰勒 著

韩瑞霞 译 郑 涵 校 265

广告研究

我们占的空间越少,就将越强大——广告如何利用性

别颠倒权力符号与社会平等观 维凯·R·谢尔德斯 著

张 玮 译 戴元光 校 287

理论研究

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

单波 李加莉^①

同大多数关注媒介控制的知识分子一样,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追寻的是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即媒介为什么会反民主,为什么为各种利益所控制进而控制大众,应在哪里改变它们?与众不同,半个世纪以来他所养成的对语言的敏感性融入到了这种理解和解释之中,显现出政治认知的内在问题:我们为何相信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宣传,尽管其主张与众多明显的证据相悖,甚至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他一直批评行为主义语言观的目的是“通过观察和操纵说话者的物理环境来预测和控制人的语言行为”,这又使他对媒介控制的理解和解释含有对政府和媒体语言使用的剖析。更为重要的是,在奥威尔问题的统摄之下,他建构了反思媒介控制的独特话语,为我们认识民主政治背景下的媒介控制提供了理论问题和思考方法。

一、奥威尔问题的内涵与意义

乔姆斯基一生都致力于解决人的本质问题(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他认为,要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必须回答两个相关的命题:一个是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一个是奥威尔问题(Orwell's Problem)。对于柏拉图问题罗素曾对此做过最好的表述:“尽管人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与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为何他们的知识却如此丰富呢?”^②与此相对,奥威尔问题则是:“为什么人对事

^① 单波,李加莉;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② Noam Chomsky,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前言:37.

实似乎知之甚少,尽管现实中的证据是如此丰富?”^①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悖论:人有充分认知外部世界、实现自由的能力,但在知的过程中,人又无不处在控制之中。

乔姆斯基认为“柏拉图问题”具有科学意义,与语言研究联系密切,他希望通过语言研究来揭示人的认知方式,进而揭示人类心智的本质。至于奥威尔问题,他认为这是个严肃的现实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紧密相关。他试图通过大量的事实剖析来揭示人性如何受到压制和扭曲,统治阶级如何掩盖事实,歪曲、操纵和控制信息,从而控制民众思想,以维护其统治。柏拉图问题涉及认知的许多方面,可简单表述为“尽管生活中证据如此之少,我们的知识为何如此丰富呢?”特别是:我们为何具有如此复杂的母语知识?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相反,奥威尔问题是一种政治质疑,“尽管生活中证据如此之多,我们为何如此无知?”特别是我们为何相信所属的统治集团的宣传,尽管其主张与众多明显的证据相悖,甚至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在形成政治观念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对众多显而易见的证据视而不见。

对于柏拉图问题,乔姆斯基从语言学角度给予了明确的解答。按照他的生成语法论,人在大脑中有一个先天的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这个语言官能本身内含的一种普遍语法构成了人的语言官能的初始状态和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为不同的语言提供某种程式,并转换为各种语言的表层语法。乔姆斯基认为,正是因为有“语言官能”这一生物机体进化遗传的禀赋,人才有认知世界的巨大能量和能力,才能用一种逻辑结构来观察、认知和理解世界,于是,人才有无限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才有属于人的创造性和综合判断。

这一解答实际上又蕴涵了另一个问题:人的认知能力受限于人的“语言官能”及其提供的语言程式。于是,问题的另一面便是奥威尔在两部小说《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之中揭露的“语言的堕落”:语言成为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动物庄园》所呈现的一种令人震惊的语言控制现象是:为极权统治服务的宣传家总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让很成问题的现状显得美不胜收,缺乏理解能力的民众欣然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众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于是,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宣传家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一九八四》揭示的语

^① Noam Chomsky,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前言:39.

言毒化问题也折射了语言控制现象:控制所有的记录,从而控制人的思想,使过去的事成为没有客观生命的东西,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己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以指鹿为马的服务于权力的“新语”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乔姆斯基认为,奥威尔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更能闭锁人们的视野。这里且不说在一个集权体制下,国家能有足够的力量统辖和封闭人们的思想和认知,即使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最民主、自由和多元的社会中,国家宗教(the state religion)和控制着媒体的意识形态机构也能通过“制造共识”(manufacture of consent)和“操控同意”(engineering of consent),使得民主社会的百姓们成为无知或头脑简单的傻瓜。这样一来,奥威尔问题便指向更内在的社会批判。在他看来,大众媒体是一个向公众传播信息与符号的系统,其功能是娱乐大众、提供信息,向个人灌输价值观、信仰和行为规范,把个人整合进大的社会机制之中。在一个财富集中、阶级利益矛盾突显的世界里,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就需要制度化的宣传。美国的媒体除了具有其他功能以外,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宣传。虽然美国政府对宣传一词讳莫如深,实际上美国的大众传媒就是政府宣传的工具,是国家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①。

很明显,乔姆斯基已转换了“奥威尔问题”的语境,即从极权主义跳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其逻辑在于,极权主义体系的思想控制远没有民主社会有效,因为知识分子只是服务于国家,鹦鹉学舌般地复述官方教条,人们很容易识别出这种纯粹的宣传。相反,民主体制寻求的是限制和决定整个思想范畴,它让基本的设想都没得到表达^②。在极权主义体系中,人们一旦识别了基于思想控制的宣传,往往会推动思想解放;而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人们在公平正义、平等表达的语境中接受着基于利益关系的思想控制,而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当民主以全球化的方式推行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失去对民主的反思力量,越来越失去对“奥威尔问题”的警

① 乔姆斯基研究美国媒体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New Mandarin*, 1969)、《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1988)、《必要的幻像: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1989)、《威慑民主》(*Deterring Democracy*, 1991)、《媒体控制:宣传的辉煌成就》(*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1997)、《宣传与公共意识》(*Propaganda and Public Mind*, 2001)等。

② David Barsamian: *Chronicles of Dissent: Interviews of Noam Chomsky*, <http://www.zmag.org/chomsky/interviews/dissent-excerpts.html/>.

惕,习惯于坐享某种民主制度、程序与理论,而失去创造民主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面对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问题。

二、民主政治的宣传逻辑

民主体制为什么会寻求限制和决定整个思想范畴?其基本的秘诀在于,民主政治生产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它又总是想架构这种权力关系,而“架构”的发生往往借助于普遍意愿、公共利益得以推行,吊诡的是,推行的结果往往是权力支配关系的形成和传播权力的分配。柏拉图曾认为,自由就是服从理性的统治,而个体在根据理性法则生活、实现善的能力上有差异,只有那些聪明的执政者才能自觉地接受道德权力的约束,进而约束底层社会分子,保证城邦的秩序和每个个体的真实利益与内在潜力。现在人们都明白,把传播权力给予抽象的理性人,这其中隐含了多么危险的专制逻辑。而在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民主观里,所谓“必须尽力表达普遍意愿”、“抱着道德责任感行事和考虑公众的利益”,又预设了制造共识的玄机。托克威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这样审视美国民主政治下的“舆论的暴政”:

“在美国,多数在思想的周围筑起一圈高墙,在这圈高墙内,作家可以自由写作,而如果他敢于越过这个雷池,他就要倒霉了。这不是说他有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危险,而是说他要成为众人讨厌和天天受辱的对象。……他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前,本以为会有人支持,而在发觉无人支持后,已把自己全部暴露于众人的面前。于是,责骂他的人喊声震天,而与他想法相同的人,则失去勇气,不敢作声,躲避起来。他只好表示让步,最后完全屈服,保持沉默,好像不该说真话而后悔了。”^①

在这种民主思维中,所谓“舆论的暴政”呈现的是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亦即舆论在权力运作中被建构的过程:在民主社会,人们珍视主权、渴望主权,但当他们越是想通过巴结大多数的思想而赢得公民权利时,他们就越会失去主权,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欲使人拜倒在多数人的支配权面前,为获取传播中的支配权而自觉接受多数人思想的奴役。这时,“主权在民”、“公共精神”等民主政治理想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工具化、程序化、官僚化的“多数人的统治”以及人的奴性的再生产。

虽然与传统的民主主义相比,托克威尔更注重思想与人格的独立及人与人的

^① 托克威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 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93.

平等,但他并未进一步揭示报刊如何制造“舆论的暴政”、如何迷失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而是注目于达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形成一致的意见和共同的行动等方面,报刊所扮演的角色。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受到了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同时,“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能使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焕然一新,才能开阔自己的胸怀,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①。于是,他指出,报刊的作用主要是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及其执行办法,使分散于各地、互不认识的人知道彼此的想法和感受,形成一致的意见和共同的行动。

可是,乔姆斯基正是从这种由媒介建构的一致意见和共同的行动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宣传逻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与赫尔曼(Edward Herman)一起致力于研究美国新闻媒体如何迎合上层阶级、愚昧百姓,如何在民主的外衣下操控普通民众的生活。他认为,只有使民众认识到媒体的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只有让他们了解到美国媒体宣传的运作模式,才能使民众幡然省悟,明白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那么他们对政府的行为就能进行更加理智的判断,对损害公众利益的举措进行抵制,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实现真正的民主。

乔姆斯基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民主观念。一种民主观念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众能有效地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而且获得信息的途径是公开的、自由的。另一种民主观念是:必须禁止公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同时必须严格控制获得信息的途径。而后者在理论和实践中由来已久。美国宪法是以维护上层阶级特权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传统为主导的,其目的拿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永久利益不被颠覆,其‘永久利益’就是财产权,那些无产者或毫无希望获得资产的人不能指望得到足够的权利”^②。麦迪逊宣称,政府的责任是保护少数富人。这就是美国民主体系从最初到现在的指导原则。宪法保护的是有产者的权利,它确保的是富裕的少数人的利益不受贫穷的多数人的侵犯。被富人把持的政府会使普通民众分化、边缘化,因为他们害怕普通民众的力量。于是政府和商业集团紧密结合设定议事日程,通过宣传操纵公众舆论,潜移默化地塑造、控制民众的思想。250年前休谟曾说,政府是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原则存在于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同时也存在于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乔姆斯基认为,政府“越自由民主”,就越有必要控制

① 托克威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 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37-637.

② Noam Chomsky, *On Nature and languag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181.

民众的思想以确保他们对统治者的服从^①。

在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中,宣传大行其道,这引起了早期媒介理论家拉斯韦尔(Horald Lasswell)的注意。他结合了行为主义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的宣传理论。他认为传播者需要有一个精心谋划的长期宣传策略,以创造出主导符号或集体符号。他预设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宣传过程,认为成功的社会运动是通过各种媒介长年累月地宣传主导符号而获得力量的。在这个世界上,要进行理性的政治辩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普通大众愚蠢无知并且囿于自己的精神病症,只能屈从于宣传家的操纵;民族唯一的希望就是让社会科学家驾驭媒体的力量来宣传“正义”,抵制“邪恶”^②。拉斯韦尔当时认为,大众媒体的控制权应该掌握在新的精英手里,并把这些人的称为“科学技术专家”。他倡导的为正义而宣传的理论成为美国政府和官方机构努力“改善”和传播民主的基础。

与他同时代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普通民众不可能像经典民主理论所假想的那样管理自己,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弄明白周遭的世界并理性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有着长期新闻从业体验的李普曼逐渐抛弃了传统的民主理论和新闻角色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民主观。他主张“民主艺术性的变革”以用来“制造共识”,即通过新的宣传手段使大众在意见上达成一致。他认为大众根本无法理解公众利益,公共事务只能被一个“特殊阶层”(specialized class)中足够聪明的“能负责任的人”所理解和处理,普通民众是不知所措的乌合之众(bewildered herd),他们只能是民主活动的看客^③。李普曼认为,对媒体进行温和而有效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社会免遭愚昧者践踏,应该让那些善意的“技术专家”用科学的方法去伪存真、控制信息。李普曼一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影响美国历史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和观点,他对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于拉斯韦尔和李普曼的宣传观,乔姆斯基在其几乎所有的论及媒体的著作中都进行言辞激烈的讽刺和批评。因为他们的宣传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型塑”(shaping)观和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模式的影响,其立论基础是普通民众不具备知识和能力来理解、判断、处理公众利益。这与乔姆斯

① 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 徐海铭, 季海宏,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28.

② 斯坦利·巴兰, 丹尼斯·戴维斯. 大众传播理论: 基础争鸣与未来[M]. 曹书乐,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81-82.

③ Noam Chomsky,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M].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7, pp10-11.

基对普通人能力的认知是截然不同的。在长期的语言学的研究中,乔姆斯基看到人具有先天的语言能力(*innate language faculty*),这种能力深深置于人脑之中,进而他认为人类的智力能够通过它自身内部的源泉而获得知识,它也许要利用外界的感官材料,但它建立的认识体系所依据的概念和原理却是独立地发展起来,全然超越任何训练和经验^①。在乔姆斯基那里,民众具有普遍的、先天的认知能力与知识结构,他们本身并不是头脑一片空白的愚昧者。而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并通过所谓的“刺激—反应”学习模式来获得的,这样人类行为则完全由其行为的后果塑造和控制。乔姆斯基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指出,行为主义的相关理论之所以受到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的青睐,是因为他们可以以此为借口,对民众进行塑造、操纵和控制。在这一点上,乔姆斯基与奥威尔遥相呼应,后者在目睹一个小男孩赶马车的情景时曾联想到:“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②换言之,行为主义理论把普通民众设定为被动反应者,解构了他们的语言能力与认知能力,从而有利于把他们纳入某种知识与技术的控制体系之中。

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使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背后的操控力量特别警觉。他看到美国政府虽自诩为一个民主的政府,但一直以来奉行的是李普曼的“精英主义统治论”,普通民众只是民主的旁观者而已。美国政府宣传的逻辑是:普通民众没有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的能力,他们对公众利益不能作出最佳的判断,需要被精英引领,需要用宣传的手段来控制这些不知所措的乌合之众。美国政府一直深谙拉斯韦尔的“技巧政治”和李普曼的“艺术性的民主”。美国政治的实质内容是: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向民众灌输各种信条和主张,预先设定一整套思想框架。他们制造“必要的幻象”与有效的情绪化的“简单化画面”,利用媒体巧妙地制造同意和假象,以便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行动,使民众在政治上保持冷漠、服从、被动的常态。在极权主义国家,政府可以挥舞大棒防止人们出轨,而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必须求助于宣传手段。其中的逻辑是十分清楚的,宣传之于民主主义国家正如大棒之于极权主义国家。

宣传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在于它能够制造共识,即通过推动同质化构建和压制不同声音才得以实现的。在民主社会里,政府的政策(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这本来是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但是,借助媒体的力量,政府就可以操纵舆论,控制公众的思想,诱导他们支持政府。乔姆斯基注意到伯纳斯

① 诺姆·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M]. 徐烈炯,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3.

② 奥威尔. 动物农场[M]. 荣如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18.

(Edward Bernays)和李普曼早就对此做了解释。伯纳斯曾说:“民主政府的领导人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对全社会有益的建设性的目标和价值得到一致的同意。”^①李普曼曾坦率地说:“美国的民主实践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制造共识已成为一门艺术和普选政府惯用的机制。”^②通过“制造共识”,政府的政策顺利得到公众的支持,民主也在形式上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不同的信息来源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那些来自权威机构和官方渠道的新闻未经任何审查修改就被媒体全盘接受,而那些来自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组织以及与统治集团观点相左的信息往往被压制或忽略。

席勒(Schiller)和斯普劳尔(Sproule)对宣传的特征所做的描述是:使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并不断重复那些简单化的东西;进行暗中的、大规模的、精心组织的传播活动;使用精心设计的狡猾语言阻止深刻的思考^③。乔姆斯基认为,在美国奉行这些原则的宣传如今依然存在而且更加隐秘、复杂、有效,这是比专制要巧妙、有效得多的一种压制。美国政府声称它的媒体是独立的,媒体的责任是挖掘和报道事实的真相,新闻从业者本着不偏不倚的职业道德和客观标准报道新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大财团为政治经济背景、遵从资本效益最大化逻辑的美国传媒时时偏离着这一切。

三、新闻过滤器:美国媒体深层的运作机制

美国传媒如何制造共识呢?乔姆斯基继而发现美国媒体深层的运作机制。在与经济学家、媒体分析学家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提出美国媒体实际上遵循着一种特殊的宣传模式,他们归纳出五大新闻过滤器(filters):①规模、传媒机构日益集中的所有权和财富以及大众传媒机构的唯利是图;②作为大众传媒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③对政府、商业公司、信息源的依赖以及对由权力机构和上述信息源资助和认可的专家的依赖;④把“炮轰”(flak)作为惩戒媒体的手段;⑤把反共作为国教和控制机制。这五个过滤器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使得大公司和政府的精英“达成精英的共识,制造出民主认同

① 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p16.

② 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9, p16.

③ 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 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 曹书乐,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85.